

中国城乡融合的空间困境与路径探索

——基于合肥市回迁社区C村的田野调查

蔡华玲*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飞速的城市化进程与城乡空间的剧烈变迁相伴共生。从空间视角分析，城市与乡村既是一组行政区划上的地理空间，也是各类政策和资源相互作用的社会空间。快速的城市化催生城乡实践空间的同步嬗变，资源与要素流动不畅的城乡二元结构改变了传统乡村稳定的生活空间，市场化进程中的经济理性至上引致了城乡居民的价值迷思与社会心理空间分异。城乡融合发展需要进行城乡空间关系的调整与再塑，以包容的规划设计与周到的政策执行从空间权利、空间要素、空间配置和空间服务上入手，建设“美美与共”的实践空间，构建悦纳融合的生活空间，打造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文化心理空间。

【关键词】 乡村治理；乡村空间；空间变迁；空间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增加到2021年的63.89%^①。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相伴共生的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之举，也是迈入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征程上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学术界和理论界对城乡融合的研究不断深化，在体制机制创新、城乡规划、要素流动和融合模式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然而对城乡融合的研究除了宏观层面的理论设计和中观层面的治理策略，还需要回归到微观层面真实的城乡空间，在城乡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从城乡居民主体出发，倾听他们真实且自由的发声，以“你我”之间的主体间性理解城乡融合，以期为促进城乡融合提供更加契合现实需求的路径方案。

一、城乡空间：一个中国城乡研究的新视角

中国的城乡空间研究起步较晚，且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学术界呈现明显的分裂式研究格局。从空间视角探讨城市治理，可以看出城市的空间创造是行政逻辑和市场逻辑的交织和融合，如在改革开放之初，受到行政逻辑的支配，第一批开放的深圳、汕头、厦门等是中国城市空间

* 蔡华玲，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本文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青年课题“数字化背景下安徽乡村空间变迁与治理转型研究”（编号：QK202302）阶段性成果。

①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访问日期：2023年9月16日。

创造的起点,进而扩展到“由南向北,从沿海到沿边”的开放格局。与之相伴生的是市场逻辑的参与,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已成为我国资本最集中、经济活力最强、经济持续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相较而言,中西部城市发展就显得相对缓慢。对乡村空间的关注最早是对乡村地理空间和文化意义上的考察。20世纪90年代,徐大伟、石忆邵等学者从地理空间的学术视角探讨了乡村的空间演变趋势^{①②}。此后,随着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程度越来越高,乡村空间研究逐渐兴起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流派。一是从国家与社会视角出发,有学者从乡村空间变迁角度揭示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的基本逻辑,认为两者关系在乡村空间变迁中经历了从总体性支配到社会化整合的演进过程^③。新中国成立后,乡土社会被国家意识深刻渗透,确立了全国无区别的政治空间^④;改革开放后,以市场发育为基础的草根力量从生存空间向发展空间演变,乡村社会空间的政治性控制逐渐消退^⑤。乡村空间被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势能所裹挟,不断被卷入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⑥。二是从日常生活视角来看,空间是一个被实践的地点。实践是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人们在空间范围内的生活实践构成了乡村社会空间的主要内容^⑦。例如“农民上楼”打破了代际居住空间既有的生产过程和逻辑,加深了父代对子代的依附关系^⑧;“撤村并居”造成老年人无力购买居住空间而被排斥到空间的边缘地带^⑨。

现有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从静态的共时性视角分析城乡空间治理的体制机制建设、治理模式创新等,较少从空间视角同时对城市与乡村空间的剧烈变迁进行立体化的对比分析,并缺少对实践的回归以及对身处空间剧烈变迁中的人的关注。事实上,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指出的,时空向度构成了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而所有的社会互动都立足于时间与空间的结合^⑩。因此,以空间视角分析与理解各种社会现象不仅能将社会的宏观变迁与微观变化有机结合,还能将社会本身的结构性与能动性相整合,从而更全面、系统地认识社会。

本文将空间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城乡空间变迁实践相结合,以田野调查“深描”时代发展中的城乡空间变迁,以主体性视角展现城乡融合中的空间困境,赋予处于空间变迁中的人平等、自由的发声权利,试图还原城乡空间变迁过程中人、地、物在共生转型中相互倾听的过程,深度呈现城乡空间变迁中的空间区隔与不平等,并探讨其发生机理和治理进路。本文的田野点C村曾经是安徽省省会合肥市下辖的渔村,村民以捕鱼为生,人口2600余人。2000年城市扩张后,C村被整体拆迁,现土地和宅基地已被建成现代化的摩天大楼,村民被安置进政府统一建设的回迁社区。C村是城市

① 徐大伟:《以城市为中心的乡村城镇化的空间模式探讨》,《江淮论坛》1986年第2期。

② 石忆邵:《中国农业生产地域分工问题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1994年第5期。

③ 李春根、罗家为:《从总体性支配到社会化整合:新中国70年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④ 刘拥华:《阅读秩序:空间语境下的乡土社会及其变迁》,《人文杂志》2008年第4期。

⑤ 张兆曙:《草根智慧与社会空间的再造——浙江经验的一种空间社会学解读》,《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⑥ 林磊:《近年来乡村空间研究回顾》,《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

⑦ 李春江、张艳:《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向的时间地理学应对》,《地理科学进展》2022年第1期。

⑧ 范成杰、龚继红:《空间重组与农村代际关系变迁——基于华北李村农民“上楼”的分析》,《青年研究》2015年第2期。

⑨ 雷望红:《空间排斥视角下农村老年人地位边缘化研究——基于山东J村撤村并居实践的考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⑩ Anthony Giddens. *Essentials of Sociology*. New York, NY, 2011, p.27.

化快速发展下城乡空间变迁的时代缩影，其地理空间已由渔村变为现代化的都市，但村民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还较多保留农村的传统习惯。C村是研究中国城乡空间变迁的典型个案，本文通过对出生年龄跨度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共36位村民的半结构化访谈和文献图片等实物资料的对比分析，以当事人口述史方式从宏观的物理空间、中观的社会空间与微观的生活空间三个层次系统描绘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乡建设过程中的空间扩展、流变与治理挑战，进而从空间融合视角探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相互融合的治理路径，以期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思考与建议。

二、“实践—生活—社会”：基于空间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空间一直以来被视为地理学的专业名词，学术界很少用它来解释社会的运行与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中也长期忽略“空间”这一“无处不在”的重要元素，一些古典社会学家更多认为空间是社会形式得以成立的条件，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容器”，而没有看到空间本身作为一种生产媒介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和象征特质。

（一）空间社会学理论的引入

传统地理学的空间分析主要是对区域分布或环境规划的研究，很少涉及空间的社会意义。1903年德国古典社会学家齐美尔（Simmel）首次提出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理应成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但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门“学科”却并未真正发展起来，甚至一直处于缺失和悬置状态，很多学者一度认为“空间”与其他明确的社会学研究对象相比，其言语晦涩、概念抽象、逻辑复杂，令人难以理解^①。随着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兴起，空间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很多学者试图对空间从社会学角度加以概括，其中新城市社会学理论的代表人物马克·戈特迪纳（Mark Gottdiener）等为空间的社会学意涵作了较为全面的注脚，他指出“空间不仅包含着行动，而且也构成了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它影响着我们对所作所为感知的方式。反过来，人们也改变着空间并建构新的空间以更好地符合他们的需要。因此，在人和空间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关系。”^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冲突让学术界重新把眼光投向了空间，并由此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空间分析范式。一是以罗伯特·帕克（R.E.Park）为代表的美国芝加哥城市学派，二是以吉登斯（Giddens）为代表的场域情境空间理论范式，三是以列斐伏尔（Lefevre）、大卫·哈维（D.Harvey）、爱德华·苏贾（E.W.Soja）、卡斯特（Castells）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理论范式。如果说前两种空间理论将空间看作社会运行机制的“自变量”，通过对空间的对象化研究来探讨空间在社会运行中的结构性影响，那么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理论则是将空间作为“因变量”，主要研究空间是如何被社会所建构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理论的引入开启了我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在当前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各类城市问题凸显的时代背景下彰显出蓬勃的学术生命力，涌现出大量探索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与空间冲突的研究成果，这同样为研究城乡关系、城乡空间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借鉴和研究参考。

^① [德]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② Gottdiener M, Hutchison R. *The New Urban Sociology (4th ed)*, Westview Press, 2010, p.19.

(二)“实践—生活—社会”：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解释框架

城市建设与乡村振兴都不能只看城市或只看农村，要在城乡互动的关系中总体把握时代命题。空间社会学理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并发展，借助空间理论的分析范式来研究当前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是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视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全球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共性，但更具有中国自身国情的特殊性，这决定了西方空间社会学理论单纯以资本的增值扩张与社会各方的空间博弈来解释我国城市空间的生产是片面的。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并没有改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基本定位，中国的城乡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嵌入的，单纯就城市谈城市发展或就乡村谈乡村振兴都缺乏辩证动态的研究视角。因此需要在中国城乡发展实践的现实背景中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社会学解释框架，具体呈现出从物理空间的变迁到生活空间的现实经历再到社会心理空间的认知体验的逻辑结构。首先，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与城乡建设政策的持续介导形塑了城乡的实践空间，即物理层面的空间变迁与生产层面的空间分异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其次，基于实践空间所产生的居住格局改变、代际关系变革、消费模式转型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生活空间变迁同样值得探讨。最后，在城乡发展实践中，人们因处于不同的空间，并在实践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共同塑造下，经历了不同的生活事件和情感体验，逐渐形成了包含了个人身份认同和集体文化记忆的社会心理空间。这是最深层的空间表象，也是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最隐秘的空间元素，需要引起更多的学术关注。

三、流变与张力：城乡多维空间融合困境及其成因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显著改变了城乡格局，以及乡村传统的物理空间与生活空间。

(一)快速城市化催生城乡实践空间的嬗变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指出，物理空间也称实践空间，“包含了生产和再生产，以及每一种社会形成过程的具体位置和空间特征，确保了连续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内聚力”^①。城市的快速发展使乡村的物理空间迅速重组，以往的独门独户被高楼大厦所取代，没有田地可耕种，“熟人社会”逐渐瓦解。

我和我的爷爷都出生在C村，村边的码头已经存在了将近100年，记忆中我的祖母经常带着我在码头洗衣服洗菜，村民们都在那里聊天，不忙的时候还会聊很久都忘了时间。来往的船只在不远处装货卸货，农闲时节很多人也会端着饭碗到那里看热闹。我没有想过码头有一天会消失，村子现在合并了，我的家现在已成了奥特莱斯商场，现在政府已经给我们整体安置到S社区了，熟悉的邻居们都消失了，我和老伴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现在感到很是不习惯，想找个人聒聒话(聊天)都找不到，以前的渔网、鱼叉我都还留着没有扔，我担心啥时候还能用得上。(村民乙，男，1953年生，农民，访谈编号22AM01)

在时间与空间相交互的社会实践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这样的地方性知识在反复的社会实践中内化为行动惯习，这种行动惯习又不断形塑着个体观念、影响个体行动。在C村出生并世代居住于此的老人们在不断习得的乡村生活惯习下有着相对自洽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模式，当面

^① 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168.

对因快速城市化而出现的拆迁和回迁时，他们往往一时无法适应，表现出对被“分配”的城市生活的迷茫与不适，因此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必然也会产生与现代化生活方式不相适应的行为模式。出生于90年代的年轻人对此又是另一种看法，他们出生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令他们很快便适应拆迁回迁后的城市生活，对出生于1991年的村民W的访谈较为明晰地反映了这一特点。在城乡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下，不同年龄、不同境遇的群体往往呈现出不同的融入状态，这也为我们今后分类实施政策提供了视角与思路。

我爸爸他们经常还会回忆当年的农忙和秋收，到了我们这一代，估计已经没几个人会干农活了，我们最后肯定是要到城市生活的，哪怕是去工厂打工，也不会在农村种地，所以对于老家被拆迁，我很开心，我家分了4套房子，政府还补贴了一些钱，我和妻子在小小区附近租了一个门面做小生意，一年也能赚20万元，孩子在城市上学，我们赶上了好时候，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也不想再回到农村了。（村民W，男，1991年生，个体户，访谈编号22AM02）

实践空间除了物理空间还包含了处于经济基础的生产空间。列斐伏尔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与空间相结合，提出空间既是生产力也是产品^①。作为产品，空间被创造的第一步便是生产空间的实践创造，即谁在利用空间，通过何种方式，生产出何种空间产品的过程。因此，生产空间是指以生产功能为主导的空间，其主要是为了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空间^②。自2000年以来，合肥市城市化快速发展，C村原本离市中心50公里，如今已基本与城区连为一体，城市区域和面积的扩张改变了C村原有的空间格局，使得城市与乡村的地理边界逐渐模糊。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原本属于某一空间的主体改变了固有的生产方式，农民与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相分离、农民与传统的生产空间相割裂。

过去这里是粮贸市场，现在这里是省政府，农民们也都不种地了，我今年46岁，已经有十几年没种过地了，家里5亩地全被征收了，我在旁边的商场做保洁，一个月3000元工资，家里也没有其他负担。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农村有一天可以不种地，也没想到农民还可以像城里人那样早出晚归地上班。（村民C，女，1976年生，访谈编号：22AW0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于生产方式。快速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城乡地理空间，城市的扩张挤占了大量农村土地，使得很多农民祖祖辈辈生活的宅基地被拆迁征收，这也改变了乡村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农民谋生的主要途径不再是种地。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小农生产方式逐渐变迁为土地流转后种植大户的机械化生产方式。可以说生产空间的变迁改变了千百年来乡村的生产格局，使得乡村生产者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过程均发生了变迁，农民不再利用土地生产农产品来维持生计，而是依赖城市化和工业化获得生存资本。乡村的衰落与农业的式微逐渐加剧，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很多原本世代务农的农民在被卷入城市后因缺乏技术和城市生活的资本，只能从事较为基础的职业，如保洁、保安、服务员、维保工人等，这在C村的田野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城市快速发展，农民却失去“故土”，原本处于乡村中心的农民被“挤迫”在城市的边缘。实践空间的分异表面上看是城市发展的必经过程，实质上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在空间置换的过程中并不一定都能获得增值收益，有些甚至从生活

^① 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153.

^② 许伟：《“三生空间”的内涵、关系及其优化路径》，《东岳论丛》2022年第5期。

世界的中心走向了边缘。

(二) 二元结构引致城乡生活空间的分层

空间的实践除了物理层面的空间变迁,更为重要的是生产空间变迁带来的乡村社会结构的重构,其中最直观的便是发挥居住、交往、消费等功能的生活空间的变迁。城市化进程将大量农村人口卷入城市,但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并没有实现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的同步发展,而是处于分层状态,凸显了居住环境区隔化、社会交往乡土化等特征。

人生的前30年我一直生活在农村,邻居们相互串门,亲戚们离得也不远,大家彼此感觉很亲切,也没有那么大的贫富之分。现在政府虽然把我们迁入城市,然而安置房跟周边开发商开发的商业楼盘差距很大,我们2008年获得的安置房,但是我们的小区外墙是白色的,房屋质量不好,小区物业管理跟不上,环境嘈杂,租房子的很多,人群混杂,房子想卖都比周边商业楼盘价格低很多。(村民B,男,56岁,1966年生,装修工人,访谈编号:22AM04)

2008年以前,我在苏州打工,老家拆迁后我就回来在附近商场物业当水电工,我们住在政府给我们的房子里。以前教导儿子好好读书他还能听得进去,后来拆迁分到了钱和房子他就开始对学习放松了,高中毕业就不愿再读了,我们就给他钱做生意,但也失败了,到现在还是一会干这个,一会做那个,没有一个成功的。家里的房子已经被他卖了两套,钱也快花完了,继续这样下去,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劝他进工厂打工,他却跟我大吵,认为自己有能力赚到很多钱。(村民L,男,49岁,1973年生,水电工人,访谈编号:22AM05)

城市的扩展和乡村空间的变迁导致生活于其中的村民丢失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熟悉感”,相当一部分群体又无法成为城市精英,只能在城市的现代化与农村的乡土性之间游移,成为“不完全城市化”的城市人。究其原因,一是外部的政策调整强制性改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空间,尤其是传统乡村的生活空间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被折叠或延展,其稳定的内在结构逐渐被打破,但与空间变迁相适应的新的生活空间还未完全建立,因而呈现出发展的误区和行动的偏差。二是内外环境影响下个体认知不足且又盲目参照导致认知失衡。事实上,在传统的生活空间里,大部分农民对自身的定位和认知较为实际,他们的生活逻辑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然而在拆迁、回迁后,C村迁居城市的新“市民”们的创业故事很多,但多以坎坷和失败告终,这里有因内外环境变迁所致的认知失衡,一些人误把身份的转变等同于能力和技能的转变,认为自己可以和城市“精英”一样投资创业,且相当一部分群体盲目模仿城市里的“成功人士”,卖了房子买豪车、出入高档场所高消费。殊不知城乡生活空间的融合不是表面上的居住格局、消费模式的趋同,更多的还关联到城乡居民的社会资本和生存技能上鸿沟的弥合。

(三) 经济理性深化城乡社会心理空间的分异

列斐伏尔曾提出“表象空间”,意指在经历了对物理空间的实践感知后形成的一种与实践感知相结合的心理想象^①。人们因处于不同的空间,并在空间关系的塑造下,经历了不同的生活事件和情感体验,逐渐形成了包含了个人身份认同和集体文化记忆的心理空间。

社会空间是以日常生活为基础、以社会关系为载体,从各种社会和文化力量中生成的空间形

^① 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98.

态,其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个具有深层影响的隐性空间。乡村物理空间的剧烈变迁与二元结构下的资源要素的隔离不可避免地造成城乡居民社会空间的分异,也就是时间上的现代与传统、空间上的中心与边缘、主观感受上的强势与弱势分异,这一方面反映在个体层面的身份认知,另一方面体现在集体层面的符号冲突。

30年前,我们都种田,每天都很忙,虽然赚钱不多,但生活得很充实。现在我没事可干,就从农贸市场批发一些蔬菜水果在菜市场门口卖,走来走去的都是陌生人,每次称秤都盯紧了、凑近了看,虽然我不说什么,但我知道那些人总是觉得我会欺骗他们,我过去再穷也不会占别人一分钱便宜,再没钱也不能做这样的事,但在这些人眼里我就是小农民,就是喜欢占便宜。(村民M,男,50岁,1972年生,个体商贩,访谈编号:22AM06)

除却个体之间的身份认同差异,不同空间的符号冲突也是较为突出的。埃德蒙·利奇曾提出一组二元对立的符号作为一种内在关系,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背景,隐喻了不同的心理意义^①。从个体层面来看,城市精英和回迁居民对各自身份的认同存在巨大差异,农村居民在长期的场域流动中获得的社会资本、教育资本与社会支持较弱,因此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感相对较差,且容易产生一种“我的空间他做主”的无奈感和怨愤感。

我在附近的小学上五年级,因为家里住的是回迁小区,平时班里住商品房小区的小伙伴们一起玩,他们嫌弃我们没有学过钢琴,还有的同学父母叮嘱他们不要和我们这些回迁小区的孩子一起玩,老师们也经常在课堂上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不重视孩子学习,不能很好地配合老师。我不知道大家都是一个班的同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分,这让我感到很自卑。(小学生H,女,2011年生,访谈编号:22AW02)

城市与乡村是一组二元对立的符号概念,身处其中的行动主体在各自符号的隐喻下产生了集体心理效应,并对另一个空间主体产生群体排斥心理。例如城市居民总是有一种农村人不讲卫生、素质低下的刻板印象,而农村居民同样也认为城市人冷漠、自私。尤其随着网络自媒体等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城乡心理差异导致诸如“炫富”“仇富”等网络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加深了大众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城乡心理空间的分化进一步制约了文化空间的融合。

不管是个体间的价值差异还是群体间的符号冲突,都是一种基于城乡居民对于实践体验和心理感知后的认知定位,其深层根源正是在于从传统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乡土人情走向经济理性之后的价值迷思。这种价值迷思已成为制约城乡融合的隐形但影响深远的因素。

四、兼容互适:完善城乡融合的空间路径探索

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历史起点,为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央不断强调推动共同富裕,旨在实现均衡而充分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是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之一^②。透过城乡建设的历史棱镜,探寻城乡融合中的空间路径,基于实践空间、生活空间与社会心理空间,从空间权利、空间要素、空间配置和空间服务等多维度实现城乡发展的兼容互适,既是城乡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之路。

^① Edmund Leach. *Culture & Communication*, Shanghai People Press, 2000, p.89.

^② 孔祥智、谢东东:《缩小差距、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一) 以空间要素均衡配置为重点, 建设“美美与共”的城乡实践空间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改变了乡村的空间格局, 农村生产空间的人地分离、生活空间的城乡分化、心理空间分异与网络空间贫困对乡村全面振兴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下各类“新城”的拔地而起, 各种新的空间形态, 如“回迁社区”“城乡结合社区”等“边缘空间”也在不断涌现, 这些空间不能简单地归类为城市空间或农村空间, 因此在顶层设计上要克服“二元”思维, 探寻一体化格局下的融合发展路径。在城市化进程中, 由农村到城市的空间集聚效应是普遍存在的, 但城市不是无序蔓延, 要更加重视城乡空间的协调发展, 走集约化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同时根据农村日趋空心化的空间事实推动农民生产方式的多样化, 发展旅游农业、观光农业等现代化农业产业。除此之外, 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要重视空间正义原则, 尊重城乡居民的空间选择权, 实行包容性规划政策, 兼顾空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为农村传统的地方性文化留下空间, 如保留承载农村集体记忆的祠堂、戏台等公共空间, 让农村居民留得住乡愁。最后, 在政策执行上既要把握力度又要兼顾温度, 高达18%的不完全城市化率意味着有大量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等非城非乡人员, 在城乡融合的政策执行中要兼顾这类群体的空间权益, 保障他们在城市享有平等发展的权利。

(二) 以城乡资源充分流动为核心, 构建悦纳融合的城乡生活空间

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结构与关系作为社会行动的能动反应最终将呈现在个体的生活空间里。在中国城乡发展历程中, 与时俱进优化城乡关系、推进城乡融合, 可有效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①。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人为割裂了城乡居民的生活空间, 造成各类资源不能顺畅流动。因此城乡生活空间的有效融合需要进一步加强空间结构的矫正调整, 健全城乡资源的分配和流动机制, 鼓励并创造条件促进城市的人才、资金和技术向农村流动, 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激活市场机制。比如, 完善城市人才落居农村的宅基地政策、提高创业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基础设施配套; 在金融、土地、科技、信息等政策上鼓励各类人才下乡返乡创业, 改变乡村长期“空心”“失血”等状态。同时, 加强对农村地区的公共资源配置, 根据乡村实际情况, 对产业发展、农村养老、慢病救治报销等亟须完善的服务领域提供充足且高效的资源配置, 提升对乡村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 有效弥补城乡居民生活权益的鸿沟。

(三) 以城乡文化互哺为手段, 打造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文化心理空间

城乡融合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多维度的工程, 除了注重在物理层面的空间规划科学性和制度层面的生活空间同步性, 更需推动深层次的空间融合, 加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互涵与心理空间的情感联结。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以科学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文化占据主导地位, 乡村熟人社会的礼俗文化逐渐呈现边缘化与空心化状态, 在乡或进城的农民群体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价值迷失、文化断层和认同危机等问题。因此, 促进心理空间的融合要树立起包容性的发展理念, 提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价值认同和有效互哺。事实上,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是城乡居民共有的精神家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城乡居民文化认同和相互融合的共有精神纽带。因此需要加大宣传, 充分展示乡村特色民俗文化 with 文明成果, 为现代社会提供鲜活的文化资源, 并从个体层面, 搭建平台让城乡居民相互体验各自的文化, 让农民体验城市现代、开放、科学、进取的文化精神, 同时让城市居民感受乡村礼俗、守望相助、淡泊隐忍的精神智慧, 促进城乡之间的文化互哺, 构建多元包容又相互认同的心理空间。

^① 姜长云:《建党百年优化城乡关系治理的历程、经验与启示》,《人文杂志》2021年第11期。

五、结语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乡村振兴、如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水平和高度。从空间变迁的历史棱镜中考察城乡治理，需认识到乡村社会已主动或被动卷入在场与缺场、流动与稳定的双重矛盾之中。应通过空间的重构和融合实现城乡多重要素的合理流动，促进生产空间的合理规划，保障生活空间的同步发展，实现心理空间互涵悦纳。城市的繁荣不能以乡村的凋敝为代价，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发展的均衡和质量，看见空间、重视空间、利用空间，以空间融合破解城乡融合困境是发展历程的启示也是创新基层治理方式、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从而真正实现城乡融合的有效路径。

The Spatial Dilemma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C Village in Hefei City

CAI Hualing

[Abstract] Over the past 45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dramatic changes in urban and rural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not only a set of geographical space o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but also a social space based on the interact of various policies and resourc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also a spatial difference. Rapid urbanization has spawned the simultaneous evolu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ractice space. The dual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 poor flow of resources and factors has changed the stable living spac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 economic rationality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has led to the value myth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spac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needs to adjust and reshape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 inclusive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thoughtful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arting from spatial rights, spatial elements, spatial allocation and spatial services, we will build a practical space of "beauty and commonness", a living space that is receptive to integration, and a cultural psychological space that integrates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Key word] Rural Governance; Rural Space; Spatial Change; Space Fusion

(责任编辑：冯贺霞 责任校对：戴瑶)